

## 第六章 合浦的金银与宝玉石串饰微雕

### 第一节 概 说

从历年的考古发掘来看，合浦汉墓中所见各类串饰最吸引研究者的眼球，一方面其数量较其他汉代沿海贸易港口地区为多；另一方面其质地和种类也几乎涵盖了汉帝国及其周边出土各类串饰。根据该地域墓葬相对年代分期的结果，确凿串饰的出土位置和墓葬单元反映其起止时间跨度横贯两汉，现已成为共识，甚至上限与下限可能还会再有所延伸。无论如何，通过串饰贸易和制作可确凿的证明以现代合浦地区为核心的中国南部郡区，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港口，亦是东西方贸易海上交流的核心节点之一。

#### 一、时代的跨度

考古发现串饰的墓葬在合浦地区主要集中在两汉，目前墓葬发掘总数已经超过 1200 座，这对于地处汉帝国南部边陲的郡区而言，无疑是高度集中的区域。从墓葬数量和墓室营造规模来看，两汉合浦地区的人口密度、经济实力稳定地处于南海四郡的前茅。合浦目前发现两座汉代城址<sup>[1]</sup>：大浪城位于南流江上游，时代为西汉中期前后，至西汉晚期废弃<sup>[2]</sup>；在大浪城下游有一处更大的城址——草鞋村汉城，时代从西汉晚期期延续至三国，应是上游大浪城废弃后新筑的合浦郡郡治<sup>[3]</sup>。

该地区汉墓主要分布于南流江下游、更靠近北部湾的草鞋城汉城遗址。大致可以分为南、北两个大墓群：

城东北区的堂排、铜鼓岭、脯鱼岭、冲口、金鸡岭墓群等，北部区的大沙洲墓群；城东南部由近及远的风门岭、望牛岭、北插江盐堆、黄泥岗、红岭头、寮尾、九只岭墓群；城南的凸鬼岭、文昌塔墓群等。

墓葬多数在城的东部高地上，分布面积约 68 万平方米千米。按照 1996 年调查统计，现存封土堆 1056 座，调查者估计地下墓葬埋藏量会达到近万座。以汉墓为主，其中应有少量属于三国两晋至南朝时期。合浦两汉墓葬时代发掘者分为四期：

第一期为西汉中期，年代上限为汉武帝，下限在元、成之际；

第二期为西汉晚期，年代上限紧接西汉中期，下限在东汉早期；

第三期为东汉早期，年代下限在章帝的建初年间；

第四期为东汉晚期，年代从章帝到东汉末年。<sup>[4]</sup>

#### 二、出土概况

公元前 214 年在秦帝国“南征百越之君”攻取岭南之地后<sup>[5]</sup>，设置桂林、象、南海诸郡，将中原文化波及至此。从秦都咸阳辐射四方的驰道也建设至此，连接珠江流域和湘江流域的灵渠使帝国的西南部至中原有了便捷的水运；远征军在构建永久城防设施的同时，使来自中原的士兵已然成为常驻南部的居民。至南越国及汉代，中原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

到此，特别是汉武帝灭南越后，于元鼎六年（前 111）设立合浦郡，使之处于帝国行政的有效管理下，生活风俗受帝国腹地影响愈加地显而易见，这也完完全全反映在合浦发现的这千余座汉代墓葬当中。

器具的使用，从某个侧面体现出时下的风俗状况，而其使用方式的研究则离不开其使用状态的分析。在秦汉时期，视死如生的观念广泛的分布和影响到帝国的各个角落。因而，当把视角聚焦在合浦地区来看，串饰的出土的数量、使用的材质、放置于墓葬当中的情况等等，不仅是研究串饰本身的基础，亦是分析本地域串饰风俗的基本材料，如此方能勾连起合浦珠饰在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线路和地位。



图 1 南越王墓镶蓝色玻璃带头

战国晚期中原文化对广西地区的渗透，表现在少量具有越文化<sup>[6]</sup>、楚文化<sup>[7]</sup>因素墓葬的零星发现。不过在这些遗存中，目前尚未发现过珠饰与微雕<sup>[8]</sup>。而在南部中国被纳入秦帝国版图之后，尤其在相当于南越国早期出现大型的具有典型汉地葬俗的木椁墓中，这些异域风格的半宝石珠饰才陆续出现。相对较早一批出土珠饰的墓葬，如著名的广西贵县罗泊湾两座夫妇异穴的大墓，其中男性墓主一号墓出土琉璃珞、玻璃珠各一件，另有球形琥珀珠两件<sup>[9]</sup>。这些与同时期广州西汉前期墓葬中所见都基本一致<sup>[10]</sup>，又如南越王墓中，镶蓝色玻璃带头、玻璃小串珠改用于“贝带”装饰点缀<sup>[11]</sup>。（图 1）由此，诸如小件玻璃串珠的引进使用，可视为早期南海贸易的间接获取品。

进入西汉中期后，汉帝国的南部海上贸易开始频繁起来，贸易和文化交流兴起直接代表的串饰，也直观地反映在合浦郡（今合浦）、南海郡（今广州）治周边的墓葬中。如合浦地区属于西汉中期的风门岭 M27，为偏大型竖穴木椁墓，一棺一椁，棺室偏于椁的西北一侧；由于人骨、木质葬具腐朽严重，只能从棺室文物分布，大致推测下葬时的布置场景：棺头立两戟、并置璧（可知墓主头部向墓道一侧），墓主头部放置有铜镜，颈项部位发现石髓狮子、玉管各一件，腰部有一件铜带钩。该墓的玛瑙狮子和玉管从位置推测应该是墓

只供阅读请勿侵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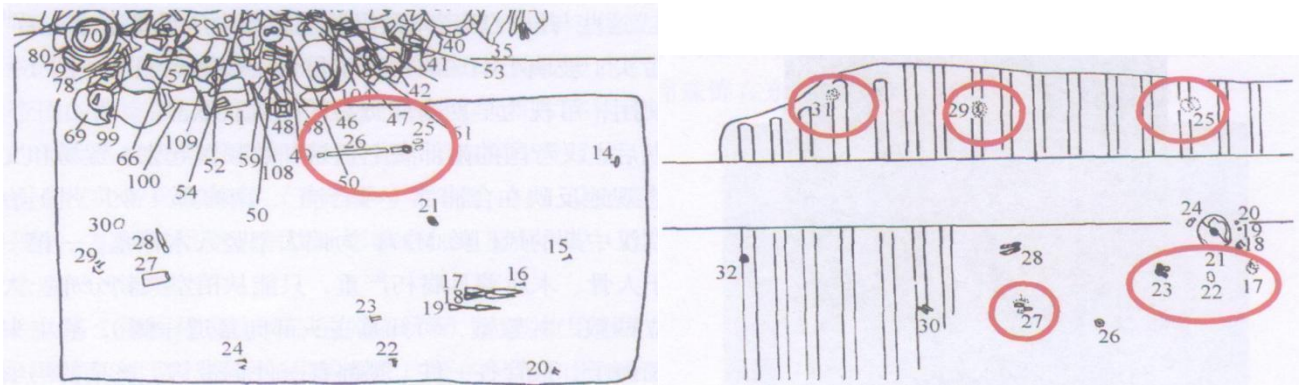
主的项饰无疑。(图2)



图2 合浦风门岭 M27 肉红石髓狮子微雕

西汉晚期是金质与宝玉串饰微雕渐而增多，在合浦周边汉墓群中频繁出土。墓葬形式以大中型土坑竖穴木椁墓为主，串饰多见于最贴近墓主的棺内。如之前的中期只零星见于的颈项部位，显得十分珍贵；后期更多的则以串联的形式铺陈在墓主的颈部及腕部，且数量激增，颇为奢华。

例如合浦风门岭 M23，是同坟异穴的偏大型竖穴土坑木椁夫妇墓葬，男性墓坑在女性的右手方，显得更尊贵。男性棺内置玛瑙挂饰、琉璃珠，玛瑙挂饰出土在铁销旁，推测为刀挂、琉璃串饰在脚端，可能是棺内的贮藏品；女性棺附近放置若干串琉璃串珠，棺内头部漆盒内也有同样的贮藏，上身头部有玛瑙串珠，两手出土玉管饰。两墓反映出性别对于串饰有着完全不同的功用选择：男性偏于对武器的装饰，女性则使用在首饰装点。(图3：1、2)



1 M23-1 男性

2 M23-2 女性

图3 合浦风门岭 M23 串饰分布

又如风门岭 M26 较 23 偏晚，但亦属于西汉晚期。棺室偏于椁室的一侧，棺头置饰贴金的壁，这点与风门岭 M27 相同。棺内墓主头向墓道，从颈部到指尖位置，依次发现各类质地的各类宝石及金银的组合串饰、玉管饰，按此是佩戴下葬的项饰和腕饰。在棺外发现两处琉璃珠和琉璃管的集中出土点，推测这些琉璃珠饰很可能表示墓主财富的贮藏。<sup>[12]</sup>

(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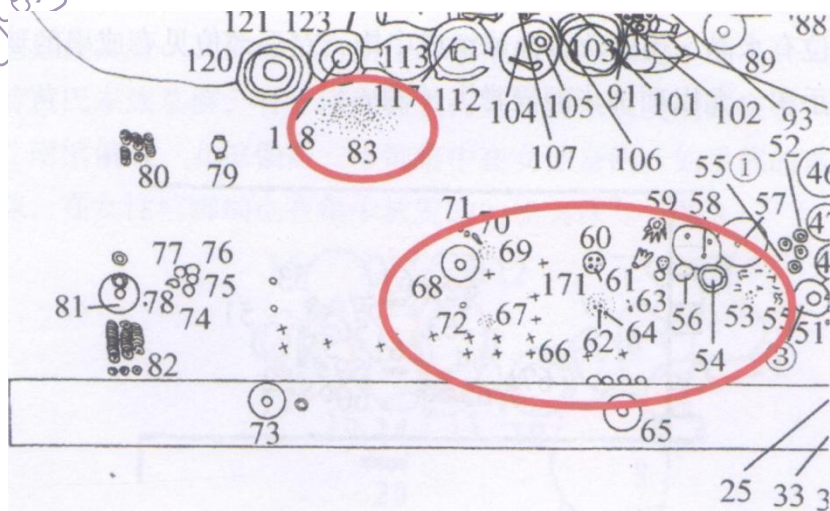


图4 合浦风门岭 M26 串饰分布

合浦母猪岭 M4 是西汉晚期的竖穴单人木椁墓，女性墓主的可能性较大（银印印文：黄营）。棺头置玉璧，颈部为琉璃珠串饰，质地丰富的一批串珠集中发现在手部。同墓地 M5 时代相同，棺中出土铁销，基本判定为男性。玛瑙串饰出土在铁销附近，为其装饰物；而棺头和棺上部(?)出土了大量琉璃串珠。同墓地 M1 置于棺西南的两件朽烂漆盒里，塞满了琉璃串珠，这或许是上述对财富贮藏判断的一个佐证<sup>[13]</sup>（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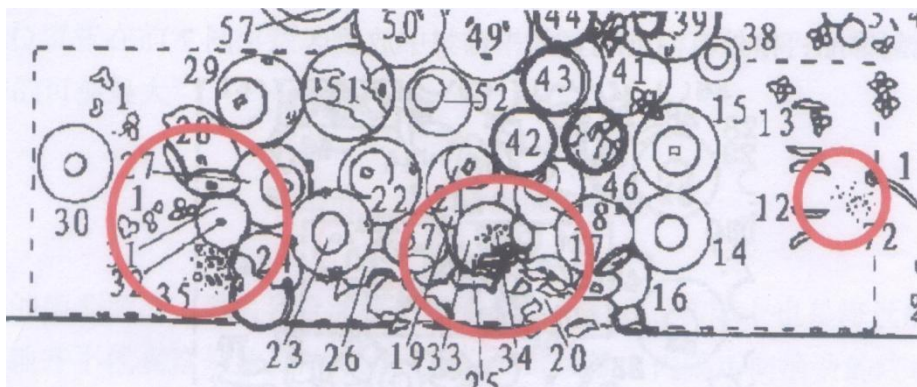


图5 合浦母猪岭 M4 串饰分布

东汉时期，合浦汉墓受中原墓葬形式结构的波及，由土坑竖穴木椁墓骤减，转而大部由砖体构建多室墓葬，男女也同坟异穴也转而同穴而葬。

如 1986 年风（丰）门岭 M10 汉墓，属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墓室部分由前室和两个后世组成，从墓葬结构来看应为夫妇合葬墓，但该墓只是西后室葬一人，东后室改为放置随葬器具的贮藏室。墓主头向墓门，西后室的棺内除使用九窍玉敛具外，大部分为串饰：颈项部位有水晶、玛瑙珠、金球组成串饰，左手部位见有成串的琥珀串珠。可见是一套项饰和手串，尤以项饰华丽异常<sup>[14]</sup>。（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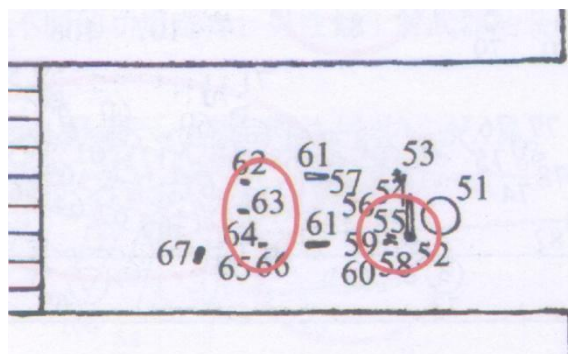


图6 合浦丰门岭 M10 串饰分布

九只岭 M5 也是一座保存完好的东汉早期墓葬，同椁双棺合葬，出土印章表明男性墓主是黄昌。随葬品显示北棺为黄昌、南棺为其妻，两棺棺头皆悬玉璧，头向墓门；女性颈部穿戴琉璃串饰、耳戴金耳珰、左右手戴玛瑙水晶串饰；男性只是在的身旁铁剑上装饰琉璃串；另在男性棺头段集中放有琉璃串珠，其性质与上述相同。<sup>[15]</sup>

著名的合浦望牛岭西汉晚期木椁墓，墓主可能与九真郡守家族有关。为单人竖穴木椁墓，另加南北耳室，规模宏大。棺室位于椁室中后部，棺内各类质地串饰皆位于铁剑附近，是为剑饰品；棺外有两处明显的串饰集中放置区<sup>[16]</sup>。（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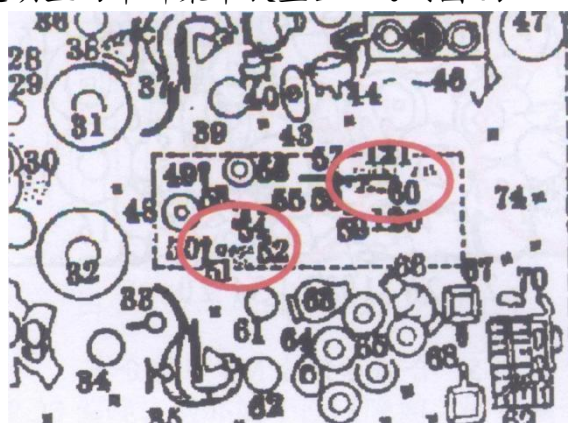


图7 合浦望牛岭西汉墓串饰分布

合浦九只岭墓群 M6a 是一座东汉中期夫妇合葬墓，随葬品显示北棺为男性墓主、南棺为其妻。男性棺头有璧，铁剑上依然有串饰装饰；女性耳部发现玛瑙耳珰，颈部由琉璃项饰，手部为金串饰。男女棺间也有集中放置的琉璃串饰。M6b 可能为前者的附葬墓，出土品表示墓主是位女性，其胸部位置出土有散乱的料珠玛瑙串饰<sup>[17]</sup>。

合浦母猪岭黄氏家族墓群，有一座保存较为完好的东汉晚期砖室墓 M6（黄良墓），为夫妇合葬墓，南棺偏东、女棺偏西，串饰集中在女性身侧。如手部的多种质地串珠、胸部的琉璃串珠，在女性棺脚端也有集中放置的琉璃珠<sup>[18]</sup>。（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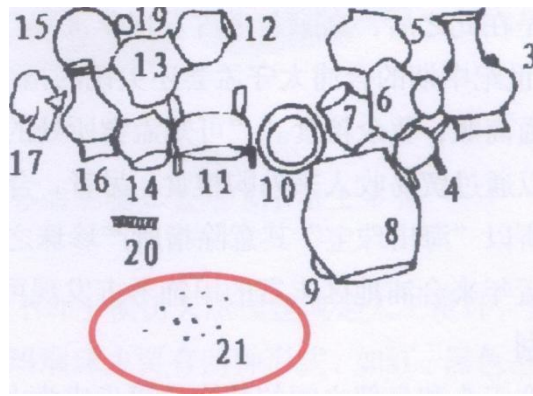


图8 合浦母猪岭东汉墓串饰分布

二炮厂 M14a 是属于东汉晚期的中小型墓葬，墓室棺内位于墓主的左右手两侧各见有玻璃串饰、银串饰，为手串<sup>[19]</sup>。

另在合浦三国（吴）如罗屋村 M6、晋墓如 M5a 中，都曾发现有琉璃珠。由于部分被盗，发现位置皆在前室与棺室之间，虽并非原位置，但大体不外乎为人体装饰或是集中贮藏随葬的可能最大<sup>[20]</sup>。

## 第二节 合浦的串饰与微雕

汉帝国的南部诸郡，番禺和合浦是最重要的两个中心，实际上也是海丝舶来运输的终点，但两地并不代表这是贸易的终点，它们要继续输入内陆走向消费的终端。

合浦郡的兴起时段契合汉帝国着力经营南部贸易的时期。在稍早的时候，合浦偏于番禺西部，临时成为安置犯罪官员的场所。最著名的莫过于西汉成帝时候，罪臣王章的妻子儿女被流放合浦的事件。幸运在于，此时合浦的开发，得以海丝贸易兴起的机遇，待几年之后的政府大赦，他们已经通过经营珠饰事业积累了足以衣锦还乡的财富。<sup>[21]</sup>

从这个故事中至少蕴涵若干条重要讯息：一是西汉元、成时期（公元前 48-前 7），合浦还处于对外贸易的建设时期，帝国可能通过以各类理由方式从内地强行迁入豪家、贵族，以充斥地方人口，输入先进的文化；二是允许迁入的内地人甚至戴罪者从事与贸易珠饰的经济活动，恐怕最重要的是来改变本地的囿于原始采集的经济理念；三是合浦汉墓最早兴盛也是在此之后，文献与考古发现非常契合。

直到公元 2 世纪中期的合浦太守孟尝还尖锐的指出：“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陆比境，常通商贩，贸余粮食。”<sup>[22]</sup>可知孟尝所处的东汉时，合浦郡以珠饰为主的贸易比重很大，可以通过贸易收入来外购粮食。另者，合浦地区两汉伊始便是优质海洋珍珠的重要产地，所以“海出珠宝”其意除指所产珍珠之外，也是表明合浦海丝串饰贸易的繁盛，这些从近年来合浦地区丰富的串饰考古发现可见一般。

### 一、材质类别

两汉时期，介于头和身部之间的装饰品逐步成为女性除特定礼仪外装饰上的需要，是

独特而有标志性的特征。此后多种宝石制品串饰中又加入金银材质，也让汉帝国女性华贵而高雅的装饰增添了张扬而个性的美。

有关合浦出土串饰微雕的材质，目前可鉴别的有人造各类玻璃，天然半宝石的石榴子石、水晶、绿柱石、肉红石髓、缠丝玛瑙、蚀刻玛瑙（玉髓）以及贵金属的黄金珠饰等。墓葬发现的情况也表明在不同阶段，各类材质出现的数量不尽相同，说明其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深层次蕴含着贸易主体、社会风尚流行的讯息。

各类玻璃串饰是大宗，时代从西汉中期一直到南朝；颜色以黄、蓝、绿、紫等透明半透明为主，红色多呈不透明的浑浊状，因配比和着色方式的差异而显不同。从科学监测看，蓝绿两色有印度、东南亚制作的混合碱玻璃，黄、绿两色有地中海的钠钙玻璃（俗称“罗马玻璃”），另有被认为是中等钙铝钾的绿、紫色不透明玻璃，以铜为着色剂的红褐色玻璃，以锰着色的紫色玻璃等，至少料质均均认为来自域外<sup>[23]</sup>。

能达到宝石级别的石榴子石在中世纪前，只产于南亚的印度及斯里兰卡，合浦汉墓出土有少量珠饰和微雕，从料质上看与南亚所见无异，无疑应该是通过海路贸易输入，出土墓葬的时代多属于东汉晚期。

实际上广义的玛瑙（或称为玉髓）类包含了肉红石髓、缠丝玛瑙、蚀刻玛瑙，只是其中一些被人类刻意的以特殊方式处理，而得到不同颜色或装饰的花纹效果二线的异常特殊。肉红色石髓是颇为较早合浦见到的串饰质料，同样被青睐的还有利用玛瑙天然缠丝纹路制成的串饰，两者流行时间皆颇长，从西汉早中期一直到东汉前期还能常常见搭配组合。肉红色石髓呈相对单一的红色，西汉晚期到东汉后少量见到白色水晶与红石髓共生的矿物组合（图9），也常用来制作水滴形的饰件。缠丝玛瑙的颜色很多样，常见为褐色带有白或黄色缠丝纹，亦能见到纯黑色、近乎不透明的带白色缠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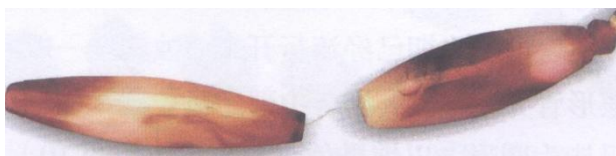


图9 合浦北插江盐堆 M1 出土串饰

蚀刻珠的最早出现的原因，不外乎模仿天然缠丝或是人工设计，实际上都蕴含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合浦所见蚀刻玛瑙珠主要有四种形式，如红、黑色基体装饰白色蚀纹，白色基体则装饰黑色条纹和红色基体装饰黑色条纹。

水晶、绿柱石和尖晶石是近乎透明的半宝石。水晶有白水晶、紫水晶、茶晶和黄水晶，其以纯透明的白水晶数量最多。绿柱石包括海蓝宝石、金绿宝石和透绿宝石，从目测性状极易与水晶混淆，从贸易价值来看，比水晶稀有，也更不宜加工。东汉时期串饰中的透明宝石数量开始增多，甚至超过肉红石髓，说明风尚的改变。

琥珀是合浦汉墓中常见的有机宝石。从周边出土情况来看，西汉时期以透明的黄色、

淡红色的琥珀为主，其原料应该来自波罗的海。而到西汉晚期至东汉，酒红色不透明或半透明的琥珀数量激增，直接说明其原料产地发生了变化。

贵重金属串饰数量也为数不少，主要以金珠为主，少量的银质珠、管。另有少量白色系透闪石玉质、绿色系绿松石类动物、器具型的微雕。

## 二、形制划分

串饰不能仅仅以材质的绚丽色泽取悦人们的欢心，在贸易经济的驱动下，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产品外观进入审美的单一和疲劳时，串饰设计和制作者需要带有更新颖的巧思来重新博得消费者的喜爱。所以，我们能通过形制的排比，觉察到这些微小饰品在时间的长河中的“进化”过程。合浦珠串饰形式颇为多样，几乎囊括了常见形制，以外形加以区别可分为管珠型和微雕型。

以数量最多的管和珠来看，按通常的认为：短、圆者可称为珠、长、尖者称为管为妥。造型以圆形、矮鼓形、长或短枣核形、柱形、多棱形、“棒槌”形、纺锥形、随形、瓜棱形等为常见。依据各类质地不同，选取的造型也不近一致。如：玻璃管珠常见圆形、扁圆形、长柱管形，均在西汉晚期出现。珠以颜色暗红、深蓝及绿色居多，长柱管以蓝绿、绿色透明为主，出现时代比珠略晚（南越王墓零星出现的蓝色玻璃珠除外）。

玛瑙类中，主要器形是管，其中肉红色石髓有些圆形珠，大部分制成长或短枣核形、多棱形、“棒槌”形及纺锥形的管；缠丝类却只是矮鼓形、长或短枣核形为主，少量“棒槌”形。缠丝类管是南部地区出现最早的串饰类型，最迟在西汉早期已进入内地；肉红色石管珠髓稍晚，大致在西汉中晚期已经流行开来。蚀刻珠一般取用较为纯色的褐色玛瑙矮鼓形、长或短枣核形管为基体，利用管中部凸棱位置蚀出白色花纹，起到凸显纹饰的效果。足球蚀刻所见皆为圆形，以纯黑色玛瑙为基体（图10）。



图10 广西贵县鱼种场M1出土串饰

水晶也多见是稍短小的管、珠类，以矮鼓形、长或短枣核形、多棱形常见；棱纺锥形的珠多由紫水晶制成。绿柱石、尖晶石？以随其结晶状的扁珠、短多棱管为主。以上透明珠、管的始盛年代在西汉中晚期。石榴石质地多见于东汉时代，因受到材质的限制，较大的管形近乎不见，只见到颗粒小的圆珠，或是在两端稍有磨凸的串珠（此类是否具有器具形微雕的意义，尚待研究）。

分为两类性状的琥珀材料，黄色透明在稍早的西汉时篇短小而随形的珠；西汉晚期到东汉，酒红色半透明的新琥珀料的出现，同时伴随出现了瓜棱、扁圆、“棒槌”形的珠子。



在西汉晚期出现，一直延续到东汉的贵金属金珠以镂空的多面形、瓜棱形、纺锥形、长“棒槌”形、枣核多棱形常见；金珠表面焊细小炸珠，造型多样，层次丰富。而银珠现有发现，仅见有长“棒槌”形一串。



1 合浦凸鬼岭汽齿场 M16A 出土微雕



2 合浦北插江盐堆 M1 出土串饰与微雕

图 11

微雕造型多样，除了选取常见卧兽之外，鸟禽、器具类、甚至小型的印章也将穿入串饰之中。目前合浦地区微雕出现在西汉中期，造型是肉红色石髓雕刻的卧兽，同类卧兽使用一直延续到西汉晚期，其中还发现过禽鸟类、摩羯鱼<sup>①</sup>的造型（图 11:1）；本地也发现了石榴子石雕刻的卧兽，时代均在两汉之交。以上造型至东汉后，选料几乎被琥珀雕所替代（图 11:2）。器具形微雕仅见连胜、小壶两类，出现于西汉中晚期，选料以琥珀、玉<sup>②</sup>和玻璃为主。另外，在合浦还发现少量未经穿孔的半宝石珠饰，其是否暗示着合浦曾经存在串饰的次加工作坊，还有待当地考古工作的深入。

### 三、文化内涵

从合浦出土的串饰与微雕，巨大多数位于墓主人的身上，即所谓装身饰品，顾名思义它们是最贴近人们身体的装饰，如：佩挂在脖子上的项链、环在手臂或者腕上手串；而男性对传统玉质品热爱的同时，不避免得将串饰锦上添花式地点缀到随身的刀剑物品上。这些小型且制作精巧的工艺品逐步盛行，是因海上贸易所引进的外来文明更多地影响了时人对于“美”的重新审视。

从时空上看，合浦大型墓葬兴起恰处于汉帝国向海外拓展的时间节点上。上文我们探讨过，中原人士的南迁促进合浦地方原有经济模式，从单一的采集天然珍珠，转而向海外贸易的突变。这些大型墓葬的突然出现，不仅表明地方贫富分化的加大，侧面展示了在短时期内海洋贸易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墓葬中葬式与随葬品也反映出墓主原本的文化属性。

在合浦西汉中期及东汉早期的大型墓葬里，我们发现葬具头部均置有玉璧或类玉璧的设施，如风门岭 M27 棺头置璧，风门岭 M26 棺头置饰贴金的璧（西汉中、晚期）；合浦望牛岭 M6a 男性棺头置有璧，九只岭 M5 两棺棺头皆悬玉璧（东汉早期）。广义上来看，葬具与璧的组合是东周楚人的葬仪之一<sup>[24]</sup>，此后汉帝国又以继承，其以南方湖北、湖南及长江下游沿岸的楚国故地最根深蒂固。一般来说，玉璧可以放于棺内敛尸，亦可悬于棺之头档

部位，细观上述墓葬的璧的出土方位，并不与通常棺内出土品发生关联，最合理解释是原本悬于葬具头档，如此现象可以肯定是承脉楚人仪轨的悬壁丧葬制度<sup>[25]</sup>。上述墓葬里的随葬明器中，滑石器占有很大比例，这是从西汉湖南与广东番禺地区特有丧葬习俗<sup>[26]</sup>。故而我们谨慎的认为西汉中期合浦的大型墓葬主人，很有可能是集中来自湖南或番禺地区，或是两地文化关联紧密的人群。他们相对较多受湘楚文化影响的，带来了诸如同时期的墓葬结构、丧葬理念和随葬品的制作方法。

再来看合浦出土这些串饰的象征意义，管、珠意义在时人眼中如同进口奢侈装饰，除了某些管珠上带有人工蚀刻或是天然“眼”状纹样（虽然对于原产地的人们具有特殊宗教含义，但对于中国人的实际意义只是特殊纹样而已）。但那些微雕串饰意义却意义非凡，下文将会谈到在海丝贸易的途中，所生产类似的微雕珠串有更丰富的形态，但帝国商人却有着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不得不思考其中的原因，如最早出现的卧兽（有学者称之为辟邪珠）的微雕珠。纵观两广所见地微雕串饰中，卧兽始现，则已是在西汉中期偏晚阶段，时间上略早于内陆。其中两广卧兽微雕不仅发现数量较多，涉及质料也十分丰富，尤其重要的是合浦凸鬼岭的那件确定为舶来品石榴子石狮子形卧兽。兽作昂首形态，小而向前凸尖的脑袋，并有突出的眼睛；特有的纵钻孔，从其前肢一直到贯穿尾部。可以说，石榴子石雕兽显得更为立体和写实，制作者机乎还能完美的捕捉到兽类扑卧时依然保持机警戒备的神态（图12）。从远方的消费者来看，这类有着具体神兽般造型微雕可以赶走邪佞，保佑佩戴者的吉祥。西汉元帝时期成书的《急就章》中，便有类似描述：“系臂琅玕虎魄龙……射魅辟邪除群凶。”<sup>[27]</sup>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所提到的两汉之际，虎被认为具有特殊的厌胜功能：“执博挫锐、噬食鬼魅”。



图12 合浦凸鬼岭M6出土石榴子石微雕

其它主题还有禽鸟、小瓶（壶）、连胜形。缠丝玛瑙及肉红石髓类禽鸟写实，因是进口产品原始意义尚不明确，但从内地仿制后的鸟形微雕来看，不外乎取自鸬、鸡甚至比翼鸟这样的汉人心中吉祥鸟类的造型。鸡可“主以御辟恶”；汉人鸬为不啮食之鸟，寓意长寿吉祥；比翼是赞誉爱情，同为吉祥。连胜又称为“方胜”，西汉晚期出现能够佩戴的玉胜，两个玉胜的连接处也被打磨成圆棒形，中部的穿孔是用来串联，其取形自汉代崇仰西王母头部所戴的一种发饰，寓意长生永驻；汉末的山东嘉祥武梁祠的石壁上就刻画了双胜

的造型，被认为是祥瑞征兆之一，旁侧题刻有“玉胜，王者（后部漫漶）”的语句。

另外蟾蜍形微雕，这显然其与西汉晚到新莽时盛行的西王母图像系统同样关系紧密<sup>[28]</sup>。因为在《淮南子·精神训》中所记：“月中有蟾蜍”，其也被认为是周而复始月亮盈亏的代表者，具有长生层面的寓意。

#### 四、工艺传统

玻璃制品大多源自铸造，再进行次加工，两汉时期中国所见玻璃制品大多如此。据检测，合浦发现的玻璃串饰里，钾玻璃为最多，钾玻璃很有可能是当地的自制；也有一部分属于中等钙铝和低铝高钙类型的，推测来自东南亚、印度等地，蓝色混合碱玻璃也源自印度洋沿岸。蓝绿色、深蓝色钠钙玻璃来自地中海沿岸作坊。当然，作为检测的结果只能表明原料的可能性产地，因为玻璃具有加热可重新塑造的特性<sup>[29]</sup>，完全存在大块的原料在不同贸易口岸重新融化塑形的可能，这个过程甚至也可以合浦进行（蛙形微雕为铸造）。华美的透明多棱柱形珠的制作，是在铸造成型后，按需要长度截成管子，就颜色和形状而言针对性模仿了偏蓝色的天然绿柱石管。

较多棱管的裁截工艺而言，一些管珠及微雕饰品还进行过二次琢磨塑形的过程（在玻璃器皿工艺里称为：冷加工）。如九只岭 M5 的那件微雕扁连胜，材质为印度洋进口玻璃，经过贸易至合浦后重新做了冷琢磨，按目前其形状推测，原可能是扁圆的玻璃珠改制。（图 13）



图 13 合浦九只岭 M5 出土玻璃连胜形微雕

半宝石、宝石的串饰和大部分微雕，目前在合浦并未发现作坊遗址和半成品，且有些宝石料质对于两汉工匠来说尚不存在加工的技术可能，所以在此还需谨慎认为它们均依赖贸易进口。如纯净的石榴子石硬度为莫氏 7.5 度，绿柱石硬度则高达 8，打孔必须借助高硬度钻头的快速钻具，这类钻具目前在国内尚未发现。

肉红石髓是人工将含铁玉髓加热改色而得到的，该技术最早见于印度（有关境外技术的探讨将在第四节中阐述），合浦少量肉红石髓素圆珠通过人工琢制成为瓜棱形珠，琢痕宽大、研磨介质较为粗糙，与汉地琢玉从技术不同；同样工具在肉红石髓的微雕卧兽、鸟禽类上表现为造型率意、不拘细节的明显特征。

而西汉晚期出现并盛行的酒红琥珀微雕上看，相对肉红石髓的硬朗琢痕，具有更多过渡自然弧面表现。穿孔也一改前者的前后纵向为腰侧横向，推测是节约打孔时间以提高效

率，减小纵向穿长孔操作的危险系数。(图 14)



图 14 合浦北插江盐堆 M1 出土的两类琥珀微雕

贵金属珠饰一部分为铸造，多面金珠则是利用特殊金属制造工艺制作，代表了高超的手工技艺。作为贸易珠中的重要一类，学者们研究认为中国出土的多面金珠应是制作于印度-巴基斯坦<sup>[30]</sup>。其基础工艺是利用金属间的焊接技术，在减少使用贵重金属原料的同时，构建起多层次几何珠形的结构，最后点缀金粟，其艺术创造中充满了空间几何思想。

(图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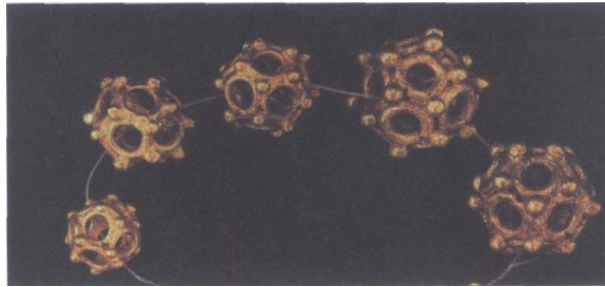


图 15 合浦北插江盐堆 M4 出土的多面金珠

### 第三节 从南海到长安

在历史时期里，汉帝国的贸易是最引人瞩目的，不仅交通范围得以扩张，其辉煌业绩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鉴于在先秦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大宗向北，指向其某种程度上是与草原马背上民族军事冲突的副产品，文化交流的同时，互通有无的“边境贸易”始终穿插其间<sup>[31]</sup>。马背上民族广泛喜爱金银装饰，而各种艳丽半宝石串饰又点缀其间，在审美上深刻影响到农耕民族。

中国商代及西周的高等级墓葬里，首先出现红玉髓的珠串，进而在西周玉组佩里大规模使用起来。不少研究表明，这类红玉髓的装饰品应是通过草原丝路来自中南半岛的间接贸易成果<sup>[32]</sup>。东周时期风靡于中原各国的“蜻蜓眼式玻璃珠”最早的制作也是仿制西亚的玻璃珠，当然从其最初在齐鲁一带发现来看，间接的通过沿海贸易原因不可忽视，之后占据广袤南方的楚国在域内大量制作，江汉及湖湘地区成为此时中国的琉璃制作中心。先秦时期南方地区发现的零星蚀刻玉髓珠，也表明在早于秦汉帝国实际控制岭南之时，半宝石串饰的贸易交流网已经断断续续或是间接模式的存在了。

各类珠饰和微雕在中国内地大规模地出现，从发现情况来看主要是起于西汉中期之后。

可以想象，在汉帝国实际控制南方诸郡的同时，通过零星的南北方贸易，形成了中原内地贵族对南方异域珍奇的供需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说早期南越国时期是逐步地、间接的，但置于统一帝国的贸易交通网络下，追求时尚之风就非常急速地席卷内地。从南至北，这在帝国内重要城市周边的高级墓葬当中表现的非常明显，时间横跨两汉直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 一、内地的串饰与微雕

汉帝国内地的串饰和微雕的出现大体可以看做个阶段。汉初高等级墓葬里始见少量蓝色玻璃串饰件和零星地玛瑙串饰；从西汉中期（武帝时期）内地显贵者墓葬里的串饰数量开始稳步增加（南越墓葬不在宏观的统计中），在武帝中后期微雕饰品出现在串饰中；随着南部贸易繁盛，进入内地串饰微雕稳步增长，步入西汉末年至新莽，达到其风靡的鼎盛阶段。

与东周频繁所见费昂斯珠不同，狭义玻璃珠在内地的发现并不多。在江苏仪征庙山（据信是汉初吴王刘濞陵墓）一座女性陪葬墓中，出土有蓝色玻璃珠，时代为西汉早期<sup>[33]</sup>。吴王刘濞时吴国富饶，国都广陵位于长江入海口，方便通过海路与闽越、南越贸易，所以蓝色玻璃原料来自与南部间接的商贸可能性最大。

在湖南长沙的一座长沙国王后墓葬里，一批宝石、玻璃串饰、玻璃器被发现，其中有水晶玛瑙珠二十四件、琉璃鼻塞一对、蓝玻璃环一件，时代相当于汉景帝至武帝早期<sup>[34]</sup>。此后与之相似的串饰，于内地频现。如武帝晚期到昭帝时期的中山王与王后墓葬里，随葬串饰见有水晶、玛瑙圆珠、玉质的微雕及珍珠百余颗<sup>[35]</sup>。昭宣时期的河南永城西汉梁王墓群，黄土山为梁王王后墓，出土各式大小的水晶、玛瑙串饰和软玉微雕<sup>[36]</sup>；近乎同时的，被认为是燕王或广阳王王后的北京大葆台汉墓里，发现玛瑙珠、琥珀珠以及玉质微雕几十颗<sup>[3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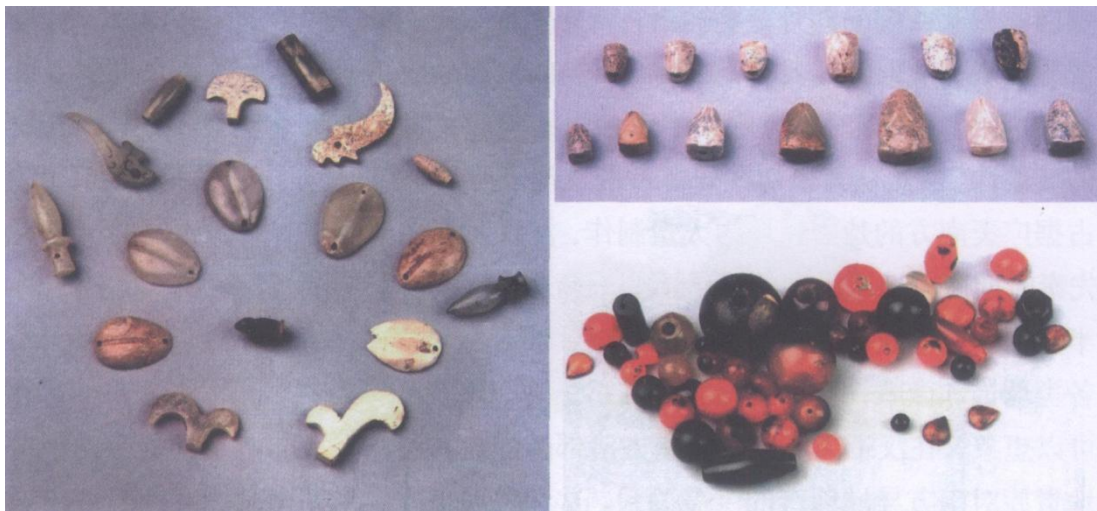


图 15 河南永城黄土山汉墓出土串饰与微雕

帝国京畿地区，相对函谷关关东而言出现的时代略晚。目前最早的墓葬如陕西咸阳马泉西汉墓，从位置看似是汉武帝茂陵陪葬墓，时代为西汉中晚期。墓中出土水晶、玛瑙、松石珠和玻璃管若干，另有玉质、琥珀各类造型的微雕饰件<sup>[38]</sup>。(图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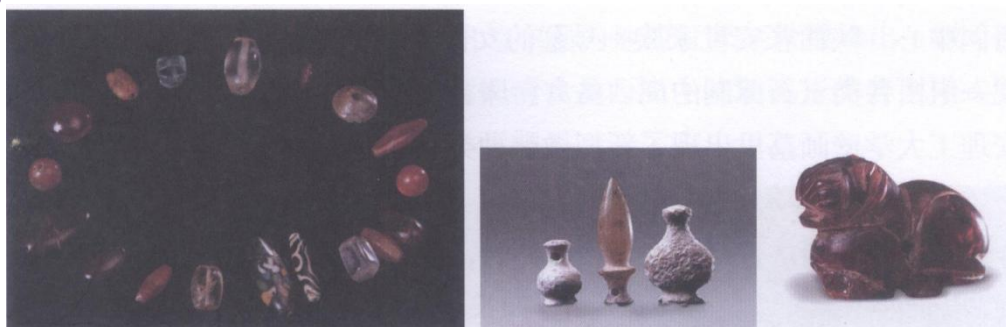


图 16 陕西咸阳马泉汉墓出土的两类串饰与微雕

此时帝国南部的广陵（今扬州），是迄今为止除南部沿海以外，串饰与微雕发现最为集中的地域。如著名的甘泉姚庄 101 号墓、西湖胡场 14 号墓<sup>[39]</sup>，皆属西汉晚期(图 17:1、2)。发现串饰的墓葬主人也并非此前的高等级贵族，从其他随葬品分析，串饰新的受用者当时地方贵族或富贵豪强，受用者也大体以女性为主体。广陵地区串饰和微雕的集中，因得益于其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与经济基础，在帝国中心，陕西张安世家族一号墓的女性墓主（可能是张安世的儿媳辈），左手腕部发现一组由各类玉石琢制的虎、鸟禽、珠、三角形坠组合的手串。此时，最重要的是在西安理工大学壁画墓里出现了新型微雕种类——玉连胜<sup>[40]</sup>，显示出内地与南部边陲口岸间流行风尚的快速互动。



1 甘泉姚庄 M101

2 西湖胡场 M14

图 17 江苏扬州出土串饰与微雕

处于中南的长沙地区，西汉晚期到新莽时，微雕继之早已流行于此的串饰出现，且频繁发现，以长沙王家族墓群发现最集中。如长沙望城风蓬岭西汉晚期某代长沙王后墓，棺内见有淡蓝色、黄色水晶珠（绿柱石？）若干<sup>[41]</sup>；岳麓与望城交界的谷山西汉晚期长沙王墓中也见有淡蓝色的水晶（或为绿柱石）长管和珠饰、酒红色透明琥珀微雕<sup>[42]</sup>（图 18）。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透明的宝石管、珠搭配琥珀的组合风格，近年在西汉中晚期南昌海昏侯墓发掘中重新得以证实，似乎表明这是一种内地特有的串佩方式。



图 18 湖南长沙谷山长沙王家族墓出土串饰与微雕

汉乐浪郡远在东部边陲，西汉中期后纳入帝国中央的管辖。在乐浪郡治石岩里九号、梧野里贰拾号墓中发现，小型的宝石串饰、微雕集中出土于女性右部手腕处<sup>[43]</sup>。串饰和微雕，还发现在蒙古草原的诺音乌拉、都日勒格那日等匈奴高级贵族墓地，时代相当于两汉之交<sup>[44]</sup>及东汉中期晚期的准格尔旗西沟畔南匈奴墓地<sup>[45]</sup>（图 19:1）。大约在一世纪前后的中亚阿富汗“黄金之丘”（Tillya Tepe）墓葬，在五号墓中出土一件琥珀卧兽微雕，即使因长期佩戴表面磨损严重，却也能看出与中国内地西汉末年微雕如出一辙（图 19:2）。同墓地（3号墓）还出土有连弧纹昭明镜铜镜，是西汉中晚期流行的典型样式<sup>[46]</sup>。



1 内蒙古西沟畔匈奴墓出土串饰



2 阿富汗“黄金之丘”M5 出土琥珀微雕

图 19

在中原短暂混乱后，步进入东汉统一，串饰和微雕仍然集中发现贵族墓葬中，不过玻璃珠延续了西汉晚期的逐渐向中下阶层的普及，宝石和半宝石串饰微雕仍然是受高级贵族的青睐。主要表现在，取用质地优良原料的串饰和微雕无一例外的被发现于与皇室的墓葬里。

近年在基建过程中被严重破坏的安徽寿县阜陵王墓，属于东汉早期偏晚（或中期偏早），事后征集的文物里就有：青金石和绿松石串饰和微雕、水晶串珠若干，另有金质挂饰等。徐州土山一号墓年代较寿县阜陵王墓稍晚，从出土物品推测墓主人可能是一代彭城王王后，银缕玉衣内发现一组完整珠串：包括绿松石、琥珀、玛瑙和玉质串饰微雕，其中微雕颇为细致、动感十足<sup>[47]</sup>（图 20）。目前发现微雕最多的东汉墓葬是定县 43 号东汉墓，发掘者

认为墓主是东汉中期晚期的中山穆王刘畅夫妇。墓中微雕数量众多，质地以绿松石和酒红色琥珀为主，以及则以玻璃、水晶、玛瑙的串饰<sup>[48]</sup>。江苏甘泉山二号墓因出土“广陵王玺”，而被认为与东汉晚期广陵王家族有关，墓中发现珍珠、玛瑙和贵金属多面金珠，以及琥珀、玉质的微雕等<sup>[49]</sup>。



图 20 江苏徐州土山东汉彭城王家族墓出土微雕

在上属于东汉帝国的内陆核心地带，串饰尤其是类别和微雕造型极度一致，表明其风格的相互影响和借鉴。在南部中古，尤以长沙为主要集散地，包括对玻璃、肉红石髓珠、水晶（绿柱石）的大宗消费，酒红色不透明琥珀、多面焊接炸珠的金珠同样为数不少<sup>[50]</sup>（图 21）。从出土串饰数量、质料来看，湖南均是除帝国南部沿海以外最大的消费地，甚至可以说是内地重要的中转场所；另外长江中下游以广陵为中心的地区的消费能力也不容小觑。



图 21 湖南出土各类串饰



同时，帝国西南边陲的广西、贵州东汉大中型贵族墓中，酒红色不透明的琥珀微雕卧兽占了大宗；相较而言，西北边陲则常见黝黑的煤精微雕、以及少量的金红色琥珀雕，显示出原料来源的不同。金质的动物形微雕，出现于东汉晚期的长江中下游的孙吴疆域内，这或许是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公元3世纪左右“吴无刻玉工”的记载<sup>[51]</sup>。

## 二、工艺与材质

西汉早期，江苏仪征庙山蓝色玻璃珎截面呈八角形、半透明，置于头部附近。珎是自东周晚期流行在中原女性耳间的装饰物，汉代依然流行。这对玻璃珎显然是进口原料，并在汉地铸造。

西汉中期前后，长沙曹巽墓玛瑙水晶皆晶莹剔透，光泽莹润，蓝色玻璃环造型为典型传统的多台面的扁体环形，由于表面风化，已不能判别是琢制或是铸造。中山国王及王后墓中所见玛瑙珠呈透明的暗红色、乳白色，扁圆形，一颗有棱；微雕见于王后墓，造型有蝉、瓶型饰、花蕾形饰、连珠型饰等，均以乳白色软玉琢制。编穿方式按发掘者复原为：玉舞人和玉蝉垂悬于中央，周围绕以设计成：长尖花蕊、瓶、连珠等形状的珠管。北京大葆台汉墓出土玛瑙珠兼有红白两色，微雕亦为软玉质。串珠饰中主体为红色，中国西汉时期偏爱使用这种淡红色或深酒红色的玛瑙作为珠饰的原料。

京畿地区串饰与微雕始现，以咸阳马泉汉墓出土串饰的发现为代表。其以无色透明水晶管、暗红色玛瑙管珠、暗紫红色的琥珀微雕所代表的南方进口物品，与代表内地传统玉作工艺的玉质微雕、传统丝路的蚀刻、搅花琉璃珠同出，昭示了陆、海两条丝路在长安的交汇，意义重大。

内地早期多见的玉质戟、斧（钺）是典型模仿兵器造型的微雕。其戟形似西汉的“卜”形戟，它中分开叉，一端横短、另一端弧长，外侧尖薄以表示刃部。斧（钺）更加写实：弧凸的刃部，两端窄尖。西汉制度中，立黄钺于车驾以示威严。现实中，这两类兵器既可仪仗威严，亦可参与斩杀。仿造用于装饰者，与稍晚后世出现的“五兵佩”<sup>[52]</sup>，同样起到了庇佑女性的功用。西汉中期出土串饰微雕均昭示着这些串饰的拥有者无疑都是西汉的顶级权贵。东方朔曾于汉武帝执政的晚期上书，描述宫掖内妇人多“簪璫瑁，垂珠玕”，认为奢靡之风应禁止。所言“垂珠玕”，可能即指配合着各类形态的微雕和串饰<sup>[53]</sup>。

西汉晚期串微雕的特点，可以以扬州邗江姚庄墓为例：发现时散落于女性的头端，由九件串饰组成：玛瑙质的管珠两件，其余七件分别是琥珀质的“工”形佩与鸟首壶形饰、煤精质的羊与鸟、白玉质的壶形饰，以及两件白玉“连胜”。又，胡场14号汉墓，串饰发现于女性的颈项部。较前者，质料与造型上更是增添了玳瑁材料的鸡和鸟禽，以及大小两件黄色偏红透明质的琥珀卧兽；尤其搭配着金质嵌宝石壶型珠，更显出来自异邦的巧工与新兴的时尚；而利用玳瑁天然纹理来表现禽鸟与鸡的羽毛也可谓巧思。煤精材质开始出现在微雕当中。

又如长沙望城县长沙王家族七号墓中所见琥珀卧兽，其与淡蓝色水晶（或为高纯度琉璃）管、珠搭配，彰显出有别与其它地区串饰的独特风情。长沙市近郊二一一号墓出土微雕，则有游禽状、伏兽、连胜诸形，也少不了水晶珠的构成。

通过东汉早期一件嵌宝石鍍金铜樽盘上的铭文可知，东汉时人们将红色玛瑙称为“閔瑰”<sup>[54]</sup>。相比西汉及新莽时期的宝石微雕而言，除保留诸如连胜、“工”字佩之类法器以外，抽象简化的禽兽类装饰品，经过东汉早期的孕育，转变成比例匀称、写实动感与雕琢细腻的圆雕饰品。有关此类写实圆雕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西汉开始在陵寝或宫阙前放置的大型神兽造像；随着汉帝国神道升仙学说的普及与推崇，到西汉中后，它们又被等比缩小成可放置于案头的玉质圆雕，以方便祭祀膜拜。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谶纬与升仙信仰极度流行的东汉时期，人们笃信经过一丝不苟雕琢的有翼神兽们是仙界代言者，它们不仅能帮助人们躲避不祥，各色的晶莹宝石更能于项首之间起到点缀作用。

东汉串饰质地中，绿松石和不透明的酒红琥珀数量在明显增加，透明宝石半宝石类造型更趋于随形和简单化。不容置疑的是，中国的宝石微雕在西汉晚期实现了自制，出现了中亚特有的青金石及绿松石料质的微雕产品，特别是青金石的普遍使用，表明中国自制串饰原料来源的多样性<sup>[55]</sup>。微雕工艺的分化正在日益显著：皇室贵族掌握着精雕细琢的雕刻品；东汉普通贵族所佩用的微雕相对简单，其继承了西汉微雕依旧保持着粗旷的加工工艺，这很可能也是随着内地微雕的普及而需求量进一步增大，导致量产的商品化表现。

我们似可观察到东汉微雕上断续而又不紧密相连接的线状纹。这是砣具琢制后才能留下的中间宽、两头尖窄的典型痕迹；在表现动物鬣毛或是禽鸟羽毛雕刻，存在断续的二次砣具琢磨修补，几次转角衔接痕依然明显。刻纹宽度与深度及刻纹槽旁无过多毛糙，加工的砣具并不宽厚，推测这或是由极薄金属薄片所承担。某些刻纹痕迹颇深，这就类似快速的、薄片状砣具旋转后形成的痕迹现象。砣痕还可以表现出丰富而健壮的肌肉和较为细部的轮廓，汉代简练的“八刀”技法从痕迹学上的判断应该是这种技法的先河。进一步说，大砣具的运用成就了极为简练表现动感和力度的雕刻技法，形成的宽大砣痕源白果断的力量表现。

通常情况下，纹饰的粗劣可能是玉工在设计与琢制上能力的欠缺，在此构图中不少的辅助性纹饰刻画浅显，这样痕迹可利用薄砣在不需施加更多压力下制造出来以外，徒手的刻画也不失是一个方便简易的做法，一些微雕卧兽表面布满短促的线条与小幅度来回磨蹭所造成的浅状磨痕。在构成主体纹饰的线条中，尚能分辨零星深宽的“打稿”砣痕，这些看似打稿的痕迹将所需要表现纹饰的框架初步建构起来，细部则使用徒手反复刻画的技法制成。且此类方法使用在汉代刚卯、严卯文字刻画上，甚至到三国两晋时期依然采用。我们看来，这也是西汉中晚期开始，外来的微雕成品或工艺与当时汉代玉雕细节工艺完美结合结果。

### 三、东亚内地的传播路线

目前内陆发现能确定的最早外来串饰品，即是河南浙川下寺春秋中晚期楚墓(M1)所见蚀刻玉髓管，拥有者是女性，名孟滕姬，研究者相信她是一位高级楚国贵族。这些管饰出土位置表明，是串联作为身体的装饰物。而这些串饰无论是制作技法，还是长枣核状的器型，都显然有别于中国传统串珠的形态<sup>[56]</sup>（图 22），最新的研究表明它们产地是北印度大型城市<sup>[57]</sup>。同类串饰在同时期或更早的内陆地区并未发现，有学者认为其来源最有可能来自南部或西南部地区的间接交流。陕西宝鸡益门村春秋秦墓(M2)也出土有线形蚀刻肉红色珠饰与浙川下寺相同，来自南部的间接传播可能性更大些。



图 22 河南浙川下寺楚墓 M1、M2 出土串饰

对于此条南北贸易曲折道路，文献曾记载相当于春秋几百年之后的汉武帝时期有过使用。汉帝国在向西南扩张的同时利用商人区西南部贸易，在此行动下，将整个西南区的道路重新描绘<sup>[58]</sup>。事实上，中国与西方国家如印度、大夏之间的贸易交流过程，西南山区密林里零散人群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著名的记载即是张骞回汉后对中亚巴克特里亚市场上出现蜀地邛杖的报告，并对存在已久的这条线路做了转述：

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sup>[59]</sup>

当时对这条线路的认识只是源自大夏商人的转述，而后部分完全来自张骞本人认识的推测。目前学界肯定这条印度通向蜀地西南道的存在，它沟通印度——缅甸——云南的路上贸易，而具体路径应该是大量不同族群以短路程所连接起来的间接交往线路。考古发现证明，古滇池旁的滇国通过此通道得到蚀刻串饰与蚀刻技术（图 23）<sup>[60]</sup>。故而在某些程度上来说，汉武帝对西南部的扩张，亦是因于张骞对西汉时期或之前西南道的不确定的估测。



图 23 云南石寨山出土滇国串饰

在公元前 221 年统一之前，河、淮域内的中国交通系统已经非常发达，通衢各列国之间的道路带来的不仅是贸易的繁荣，更是在秦国的战车与铁骑通行下建立起统一的帝国。

秦帝国大规模增修道路，弛道的修建完整的构建起帝国有效地高速道路系统，当然它的最大功能是将皇帝的政令以最快速的方式传达至帝国的各个角落。通向中国南部的弛道是武关道的延伸，过长江后水陆并进抵达南海海滨。秦帝国在南部交通网的营建里，灵渠的水路系统无疑是最重要的节点设置，在其建成的早期军事目的十分凸显，帝国腹地的精锐通过水路源源不断输入岭南。此后南越国时期，与汉帝国关系的摇摆使得南越对灵渠的掌控无疑在于军事控制，贸易退居似乎并不重要的地位。西汉中期后，汉武帝并取南越，南部设南海、合浦、苍梧等诸郡，合浦郡辖合浦、朱卢、临允、高凉及徐闻五县，郡治合浦。合浦与灵渠所在苍梧郡同属交州刺史部。此时帝国的南部贸易乃至对外贸易中，灵渠发挥重要作用才更综合地呈现出来。大体上说，灵渠它沟通了广西的漓江和湖南的湘江，从而使得南海运抵合浦、番禺（今广州）两大贸易集散地的国外货物，能够完全通过水路快速地运输到长江流域。

通过上文对两汉时期内地微雕的发现情况大体梳理，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它们从南方两广输入中原腹地的传播线路（图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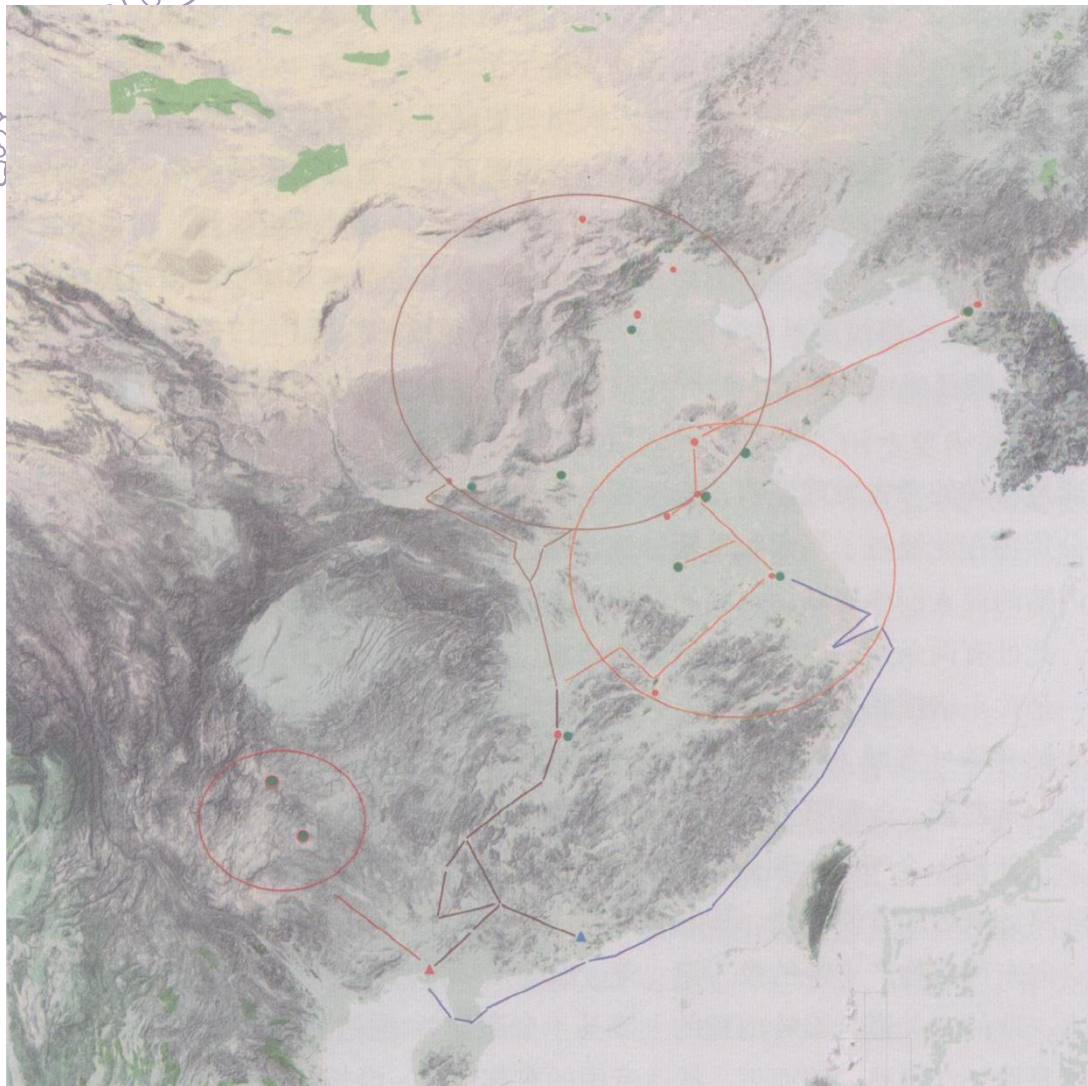


图 24 两汉时期南部串饰输入内陆路线示意图

当海运贸易货物抵达合浦郡合浦县（今草鞋村汉城）后，经过商人们的分拣包装，再重新走向新的更为广大的贸易征程。由于南中国崇山峻岭的阻碍，交通运输多利用水道进行。不过相对远绕东亚沿海的海路而言，安全系数远高于后者。如果单从贸易经济而言，商人们更希望直接参与到终级买卖当中，以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我们更相信他们选择一条相对曲折却更加安全的古道。即是自合浦县登船沿南流江逆流而上，经朱卢县（今玉林市）转北流江而上，由于山地的阻挡，必须暂转陆路才抵达苍梧郡的郡治（今梧州市）。苍梧郡郡治苍梧县位于郁水（今浔江）与桂江交汇之地，上达西江，下注珠江，水运体系发达。货物在此重新上船，过猛陵逆郁水而上，过郁林郡的郡治布山县（今桂平市），逆流入潭水（今黔江、柳江）至潭中县（今柳州市），向西北入溶江（今清江），改行一段陆路抵始安县（今桂林）。另一条线路在苍梧县可取道漓水（今漓江）直上，抵始兴县。两条线路相比，前者虽水道漫长，沿途有郡治重镇，水势较缓；后者路径短直，沿途地理条件颇恶劣，人迹罕至。

至始安县的货物，标志着正式进入荆州刺史部管辖的零陵郡。从始安县继续沿漓水而上，至此已抵贸易线路上重要的节点——灵渠西口，通过灵渠的多级转运，货物已从珠江上游流域进入湘江的上游流域。同样，番禺的货物直接取道珠江，到苍梧县后同样向西或北，抵灵渠再转运至零陵郡。入湘水过零陵县，又至零陵郡郡治泉陵（今零陵）后，顺水而下，一路过酃县（今衡阳）抵帝国南部重镇长沙郡（国）都邑临湘（今长沙）。上文所论，湘江流域的故楚人族群和楚文化因素南扩，大体也是沿此路反向流动至帝国的南部沿海。

通过科学的考古发现证明，临湘是串饰和微雕消费的内陆重镇。可以推测，有相当一部分货物在此经过了售卖和重新分拣，再进入下一个层级的传播销售。至此，顺利深入到内陆的商人们再次利用水利的便捷，他们从临湘城再一次出发，自湘江入洞庭云梦之泽，此处有两条通向内陆中心城邑的路线。

一是关东诸郡和关中地区的道路。其沿江而上入云梦抵大江岸边的南郡江陵（今江陵）水陆并举过宜城（今宜城）、达重镇襄阳城（今襄阳）；或可入竟陵（今潜江），沿汉水而上抵襄阳。自襄阳分道，向关东诸郡的线路需向北，入南阳郡，沿清水（今白河）而上，过新野（今新野）到南阳郡郡治宛县（今南阳）。至此已完全进入平坦的中原内陆，陆路运输更加方便快捷。其向北可直达经济发达的司隶校尉部的弘农、颍川、河内等郡；向东可达物产丰饶的豫、兖、青、徐等州。另有一路自襄阳沿汉水干流而上，再入丹水，取故武关道抵秦岭南麓的上雒县（今商县），通过陆路转运至京畿地区<sup>[61]</sup>。

二是取长江水路顺流而下，抵达帝国的东部地区。沿长江干流而下，进入扬州刺史部所辖，途经豫章（今南昌）、庐江（今庐江）、最终到达广陵郡，吴郡与会稽郡也应在其商业辐射范围之内。汉帝国大多数的中心城市都是坐落在黄河、淮河以及长江沿岸或附近，沟通这些内陆河流贸易路网，相对于东部沿海水路而言更加安全。广陵郡周边河网密布，向北有中渚水通淮水（今淮河），以淮水向上可沟通九江郡寿春（今寿县）；淮水中道可取泗水抵东部徐州刺史部及梁、楚、齐、鲁等国。

当然，南部通往内陆贸易道路中，可能还有从缅甸陆路再入蜀郡，再由汉中抵达长安的「身毒道」<sup>[62]</sup>；或从番禺到长沙及豫章郡，同样也可以陆路通过桂阳郡（今广东韶关）进入湖南南部，再利用连接长江干流的水系进一步向内陆输送。

不能忽视的是，在陆路繁盛的同时，东汉时期（公元83年），来自交阯（今越南中北部）和其他临近郡县的物品开始从海路，途径今福建、浙江海岸抵达长江入海口，再逆江流而上，通过沿江的中心城市——最可能的即是广陵郡（今扬州），再转运至洛阳<sup>[63]</sup>。广陵甘泉山据研究为东汉广陵王家族墓，二号汉墓中曾发现过罗马控制地中海沿岸时期的胶胎玻璃梳残件，其时代相当于公元1世纪左右<sup>[64]</sup>，很有可能是通过海运抵达广陵。

关于此条线路，有学者认为这显然是东汉政府努力改善水路和陆路交通，主要是受到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考虑所驱动<sup>[65]</sup>。无论如何，这条被官方所选取的线路想必是一条相对成

熟的海路。另外需要阐明的是，西汉中期出于军事目的而建造大型的在海上航行的著名楼船，为此后海上交通工具建造技术的进步，提供了客观上的技术可能<sup>[66]</sup>。从文献上的记载来看，这类船只具有非常巨大的运载能力。广州东汉墓曾发现多件陶质船只模型，清楚地显示：汉代的船前安置巨大的锚，船尾有舵，船身用16支桨作为动力<sup>[67]</sup>。或许因为早期内陆线路需要逆流而上，越到上游，部分内河的水深与河宽无法满足支撑大型船只的航运条件，在通过陆路间接转运，而转运频繁带来运输成本和风险的增加。这使得大宗的官方贸易运输转而更单一运输方式的海路。由此看来造船技术的提高，让东汉帝国的南方贸易线路相比较西汉时期拓展了很多。

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些船只沿线可能停靠的港口及港湾如：会稽郡（今绍兴）、吴郡（今苏州）、广陵郡（今扬州）等地，发现东汉时代的墓葬里都曾见过半宝石的红玉髓质地的耳珥饰、蓝色的琉璃串饰等，无论料质和器形与帝国南部的合浦、番禺所见完全一致。特别是西汉时期吴郡南部地区（主要是指杭州以南宁绍地区一带），从西汉未曾发现串饰至东汉开始陆续出现，也展现出海运多线路的拓展中，丰富了中国人的首饰物品。而此时的合浦郡，因合浦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墓地所证明，此地除了作为域外产品的转运集散中心以外，还承担着作坊制作、再加工的可能，是内陆地区重要的串饰加工、供应地点。

汉武帝与张骞关注的古西南道在东汉时期文献记载逐渐显现。东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永元九年（公元97）以及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西南掸国（今缅甸）国王经过西南道向汉廷通使请贡<sup>[68]</sup>。看来直至东汉时期，这条间接的古道被中原人所逐渐熟知，中南半岛北部与汉帝国西南发展起日益紧密的经济关系。帝国开始沿着这条古老的商道开始与缅甸甚至更远的印度进行交往。

有关西南道的另外一项例证，即是东汉时期通过西南地区贸易进入内地的琥珀制品。从质地的性状来看，考古学家们倾向于这些酒红色略显不透明的树脂化石的有机宝石，产地来源在云南南部哀牢山和缅甸地区。《后汉书》中说位于云南缅甸交接处的永昌郡特产琥珀原料。这些与考古发现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到东汉时期，之前所常见的一类透明色泽金黄透明的琥珀原料逐渐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半透明色泽更加红艳的品种。南部商人以更加经济的原料，替代了成本较高的远舶产品，有意思的是内地消费者也颇为欣然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朝鲜半岛以今平壤地区为中心的汉乐浪郡两汉墓葬里，曾发现过为数不少的珠串饰和微雕，质地及造型都能在内陆找到相应的原型。汉武帝时期，帝国通过对朝鲜半岛设郡向东拓展并加以管控，内陆和半岛交流已为常态。通常陆路必须绕道辽东，而渤海湾的直线航运成为交流最便捷和最主要的交通方式。帝国的军队也是通过海运从山东地区横跨渤海，自大同江入海口逆流而上抵达乐浪。不容忽视的是：乐浪汉墓中高等级贵族以王姓为主，而王姓又是山东（琅琊地区为中心）的豪族；这些墓葬的构筑方法和形制在大体上与山东

地区相同，并在两汉时期保持相当长时间的同步性。由此可见两地间通过以家构建起的血缘互动、以帝国政权管控的政治管辖、以及以贸易互通形成的网络，都全方位地促进了内地与半岛的文化交流，作为流行风尚的标示串饰微雕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串饰及微雕在蒙古高原的公元前后匈奴墓中的发现，表明匈奴族群也开始自觉或被动地受汉地风尚的左右。如果早在2个世纪之前，长城以南的贵族间则是流行着以各类黄金饰品胡风时尚的另一番景象。这种大相径庭的原因与匈奴自身的分裂衰弱、西汉帝国对南匈奴的管控密不可分。在西汉晚期的元、成帝期间，匈奴单于通过纳贡表示臣服，从而获得南方帝国包括珍奇、丝织品、粮食等等的丰厚赏赐。著名的诺颜乌拉墓地所发现精美汉地丝绸、宫廷铭文的漆器，都表明很有可能是来自汉廷皇帝的礼物。这里发现的半宝石串饰及微雕，显然不同于同时期内陆西域所见（琉璃、蚀刻珠饰），反而与中国发现相同，展现出东亚南北的文化渠道开始反向主动灌输。

中亚阿富汗黄金之丘五号墓中所见的琥珀卧兽微雕，无论从料质、造型及工艺上来看，是比较典型的西汉晚期汉帝国制作的微雕串饰。学者们一般都认为这件微雕和另外一座墓葬出土的连弧纹铜镜均来自东部的汉帝国<sup>[69]</sup>，但是对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直接贸易尚存争议。实际上，我们不能忽视在公元前后匈奴在接受汉帝国丰厚的馈赠之后所做的经济行为。匈奴作为东西方贸易的直接参与者，通过马背上移动贩卖的经济模式，使得当今中亚发现了为数众多的汉代漆器、铜镜以及少量玉器。正如近年来在南西伯利亚发掘的匈奴墓葬里，汉代的金银制品、丝绸、车马构件与希腊风格罗马银器并出<sup>[70]</sup>，更形象地展示他们如使者般间接辅助了东西方的贸易交流。

从更大的时空来看，海路而来的各类串饰微雕，通过屹立东亚的两汉帝国的汇聚和再改造再向东北、北部地域做以文化辐射，在两三世纪的时间里引领周边串饰品的潮流。不同于先秦时期以政权关系为主导的由北向南草原文化的风靡，西汉帝国开拓了以海上贸易为核心的文化交流，它较陆路更为便捷与迅速，构建起的联系也更为牢固和顺畅。

#### 第四节 海丝视野里的串饰微雕

##### 一、文献里的线路

贸易是汉代中外经济交往的主要方式，商人通过贸易的方式推进了汉帝国的扩张，不过南北方的贸易方式差异相当之大。北方处于陆路的边境贸易；南方则侧重于海上贸易。有关公元纪元前后的文献，留下西汉时期中国海上贸易最重要的记录：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谶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

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



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sup>[71]</sup>

这里有关地名的对应还有学界进一步解答，目前的通行研究指向：“都元国”最早认为是苏门答腊岛北岸的某个地点，后被认为在中南半岛南部某地，或是湄公河三角洲地带的大型城邑；“邑卢没”是对缅甸南部萨尔曼河口附近的阿尔曼尼亚(Arramaniya)；“谶离”是缅甸的南部伊洛瓦底江的布干城(Pugan)；“夫甘都”是伊洛瓦底江下游左岸的塔格翁城(Tagaung)附近；“皮宗”或是马来西亚西南端的普罗皮珊(Pulaw Pisan)岛；“已程不”是印度南亚次大陆西南部的斯里兰卡的锡兰(Ceylon)；而最有争议的黄支，似乎是印度东南部的坎基维拉蒙(Conjieveram)。这些具体到行驶方向、日程、风俗的记录，完全可称之为南海贸易指南。这些贸易又有隶属皇帝“黄门译长”掌管参加，似乎能说明远在长安城的皇帝本人及内府积极参与了对南海及印度诸国的海上贸易。中国利用黄金和丝织品换取明珠、琉璃和奇珍异宝。这里最早提到将中国内陆产出丝织品，作为间接交易的主要商品。在稍晚时期，中国人甚至十分清楚，印度和西亚商人利用海上贸易所得丝绸，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sup>[72]</sup>。

当然这条海路的交往是相互的，到东汉时期逐渐分担了陆上丝路作用，成为重要的官方交往的通道。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第一次罗马国使通过日南到交趾郡一路航行到中国南部，再步入内陆的国都洛阳；东吴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6）有罗马商人秦论也按此线路抵达东吴。同样在西方文献中，对公元1世纪左右的罗马在印度洋周边活跃的贸易有着清晰的记载<sup>[73]</sup>，这些均表明中国罗马之间民间的海上贸易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接触。

本章第三节中从航海技术的突飞猛进角度探讨了南部中国海沿岸海路的繁荣，但如果从大的时空背景来看：自西汉—王莽末期到东汉初年的几十年间，匈奴自北南下、西羌自南向北夹击，帝国暂时失去了对西域的管控，传统丝路阻塞不通。在这样情况下，反而增强了中、西亚商人南下取道海路的信心，陆路贸易的断绝直接刺激了海路的畅通与繁荣。上文中所列举和分析的，合浦郡周边汉墓串饰微雕的发现情况，最繁荣和集中的时代也正当此时。

东汉帝国对于南部日南、交趾郡据点的牢牢控制，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是海上贸易利益的驱使，其中交趾郡以特产、转运珍奇异品而著称。史料曾记载汉明帝时期的郡守张辉在任上贪污，被告发后处以极刑<sup>[74]</sup>，想必这种犯罪一定是出于本地贸易经济的繁荣。所以，上述这两个环绕大半个南中国海的据点，对于帝国疆域南扩、经济对海洋的延伸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充当了帝国与海洋国家之间的交往的纽带。

不过由于早期材料特别是南方海上贸易文献零散，这使得从印度洋到南中国海沿海的

考古发现，逐渐成为重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的第一手材料。这也是下面需要重点介绍的。

## 二、中西亚路线上的发现

自合浦港南下，经过北部湾，再往南就是南海以及广袤的东南亚、南亚及地区。在这些半岛和群岛上，珠饰的制作和贸易由来已久。如果说环太平洋西岸的玉作传统一直有所传承的话，此地从贸易出发珠饰制作可能便是基于此。以中国南海为基点，由近至远的排列：越南南部、泰国中部都是在公元几世纪前后十分活跃的珠饰微雕制作和贸易中心；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不仅是各类串饰的原料产地，也是其中部分的初加工地点。所以串饰也是南亚次大陆与东亚之间互动的文化桥梁。

越南早期文化显示，越南北部受汉帝国所设交陆、九真、日南三郡管辖；南部沿海、尤以湄公河三角洲一带地域文化显著。近年考古发现如故日南郡今岘港一带遗址，出土批量的多棱肉红石髓串饰、卧兽与鸟禽微雕，同类品已在合浦汉墓中发现过<sup>[75]</sup>。（图 25）



图 25 越南岘港周边发现的肉红石髓串饰与微雕

沿中南半岛向西有一条狭长大陆伸入海洋，通常称之为马来半岛。在马来半岛中部，即泰国领土的狭长中部一带考古发现了一系列的大型古代城址，如三乔山(Khao Sam Kaeo)、差那港、三佛齐山（东岸地区）、金山镇、贵邦（西岸地区），其中的三乔山最为著名，出土了为数众多的串饰及微雕，其中不乏玻璃和半宝石半成品遗物，显示出加工作坊的地位。地中海希腊化、南亚印度及伊洛瓦底江流域的各类文化因素在这里汇集，这些遗址也成为连接自东岸泰国湾至西岸印度洋间贸易网的站点。

伊洛瓦底江注入印度洋，沿河此时分布着骠(Pyu)文化，受海洋贸易的影响，该文化以制作超长条形蚀刻管珠串饰及走兽微雕闻名，玻璃制品有环和臂钏<sup>[76]</sup>。不过这些较泰国那些串饰来看，汉帝国域内几乎不见骠的文化遗物，或许风格并不是汉地所能接受。

南亚次大陆的南部，是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记录的末端。阿里卡梅度(Arikamedu)是印度著名的海港遗址，是近东与远东海洋贸易的重要港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石榴子石串饰，最近检测表明，合浦出土石榴子石在矿物结构上与其有着共同性，此地应是来源地之一。

两汉与南海的贸易，通过上述这些点和线间接或直接地关联在了一起。如果按中国南海周边季风区和洋流分布规律，我们推测自合浦出发的贸易船只可利用北半球的冬季东北

季风启航南下，至夏季可利用夏季西南季风和台湾暖流返航。不过航行路线和航行周期比我们想象的情况要更加复杂。

### 三、材质、形制、加工及文化内涵

在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及南亚次大陆航线上的发现，可以说明公元前后几世纪之内南海丝路珠饰贸易的繁盛。通过考古发现，这些串饰及微雕的原料产地、制作地点、加工技术等问题，目前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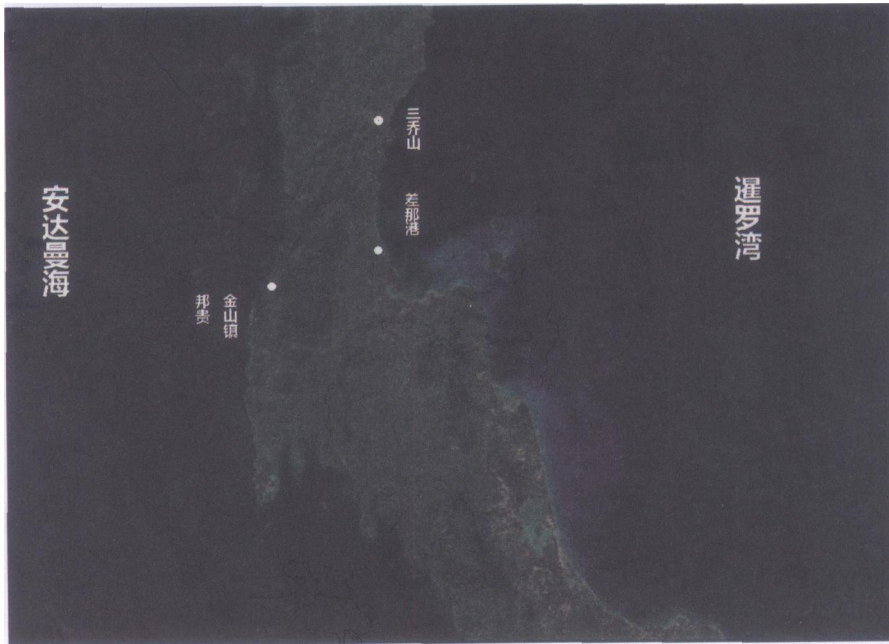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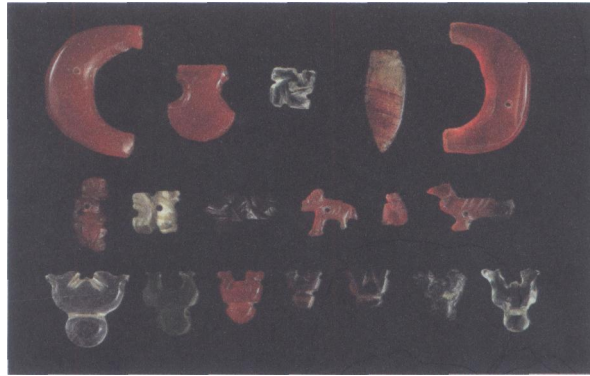
图 26 泰国中南部珠饰及微雕制作的港口城市

泰国和印度是南海珠饰的主要产地和制作中心。泰国的制作中心位于马来半岛狭窄处，即三乔山(Khao Sam Kaeo)、差那港(Ta Chana)、金山镇(Phu Khao Thong)、邦贵(Bang Kluyai)等处。它们均东临暹罗湾、西傍安达曼海，这里也是东亚海与西亚海的便捷路上管道。(图 26)

三乔山在马来半岛东岸靠北部，所见珠饰以半宝石和贵金属珠为主要质地，其中有缠丝玛瑙、肉红石髓、玉髓类、水晶、蚀刻类，而琉璃珠数量很少。造型以管珠、多种造型微雕为主，微雕有兽、鸟禽、摩羯、“三宝”珠(图 27:1)；黄金珠设计造型多样，也见到与南中国发现的多面珠形。差那港偏南，主要发现的是半宝石珠和琉璃珠，其中半宝石珠以缠丝玛瑙、水晶和肉红石髓为主，造型多见多面菱形、圆珠、扁圆珠、鼓形短管和两端磨凸珠等；琉璃以蓝绿微小圆珠为主。微雕与三乔山所见类似，极少量的贵金属珠饰(图 27:2)。金山镇在差那港对应的暹罗湾西海岸，此地因出土贵金属串珠饰品而著称。发现肉红石髓圆珠、橄榄形珠并少量微雕等，琉璃珠多以独特的黄色小圆珠为主，重要的是发现了融化的琉璃块，表明该地的作坊性质。邦贵在金山稍偏南的海岸，半宝石串饰为主，并见缠丝、水晶、蚀刻等珠和不少微雕类(少见肉红石髓质)，贵金属珠饰中见有多面金

珠。

仅供阅读 请勿侵权



1 三乔山发现的微雕串饰



2 差那港发现的串饰与微雕

图 26 泰国中南部发现的珠饰及微雕

在上述四处地点，都发现了串饰的原料，以及大量的半成品。学者们认为这里也许是专门生产外销重要制作、精加工的集散地。其中三乔山可以确定是肉红石髓、缠丝玛瑙珠饰的生产地，但蚀刻可能是进口产品；而差那港发现了生产玉髓、水晶的大量半成品，说明其为串饰成品的产地（图 27）。上述两地其中的部分原料并不是地方特产，或是来自更西方的贸易。或是暗示与更远西海岸原料产地的供需贸易。



图 27 泰国中南部发现的串饰宝石原料及半成品

众所周知，南亚次大陆南部和斯里兰卡是半宝石和宝石的集中产地，如缠丝玛瑙、无色的石髓、石榴子石、品质优质的绿柱石等。而印度本身自青铜时代早期，印度河流域的早期城邦国家就开始制作肉红石髓、蚀刻珠饰已供应近东两河流域、埃及的奢侈品消费，例如著名的乌尔王后墓中，就出土了大量肉红石髓的串饰。随着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宗教的兴盛（主要是佛教）社会对串饰的消费品需求提高（图 28），原本的串饰产业显得捉襟见肘。所以至公元前后几世纪中，印度沿海以串饰制作为主要手工业的港口骤然增多。同时，串饰海上贸易的网络已向远东成功拓展。串饰制作技术和造型观念也同时在向外输出，与印度相隔大洋的泰国发现并不属于地产矿原料和大量半成品也即是证明。



图 28 捷陀罗地区发现的造像与串饰微雕